

論社會理論對中國新聞業的解放潛力

● 李金銓

學說的衝突不是災難，而是機會。

——懷海德 (A. N. Whitehead)

社會理論對於解放中國傳媒與新聞實踐有何意義？我打算從三種社會理論着手：自由多元論，80年代中國的「老左派」，90年代中國新興的「新左派」。這三種理論有內在的聯繫，也彼此對立，其勢力的消長反映了國內外社會政治背景的變化。

中國經歷二十年的市場改革以後，權力與傳媒的錯綜關係起了重大變化，如何闡釋這個變化並不容易。我在這篇文字裏想粗略地討論一個問題：社會理論對於解放中國傳媒與新聞實踐有何意義？這個母題包含幾個子題：放在全球化的架構來看，國家與市場的交光互影如何影響我們對傳媒自由和平等的建構？新聞從業人員和公眾在這個解放的過程中擔當甚麼角色？各種社會理論建基於甚麼認知的旨趣和社會立場？

我打算從三種社會理論着手。首先，自由多元論視市場為抗衡國家控制的積極力量。第二種理論可以泛稱為80年代中國的「老左派」，與當時方興未艾的政治改革力量結盟，企圖在理論上解放官方的機械馬克思主義，如今回頭看，他們的努力似乎功虧一簣了。第三是90年代中國新興的「新左派」，他們憑藉西方各種批判理論力

抨中國傳媒的商業化。這三種理論有內在的聯繫，也彼此對立，其勢力的消長反映了國內外社會政治背景的變化。我的取徑一方面檢查經驗研究對具體問題的勾勒，一方面關照社會理論的總體闡釋，期使具體的研究得以在廣泛的語境中評估。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傳媒的變化，有的從內往外看，有的從外往內看。張旭東似乎認為對中國社會的了解不是多寡的問題，而是病在觀點僵化^①。果如是，幾個互異學說的競爭與對話未始不是(像懷海德所說的)提供「一種機會」，對於建立內外滲透互融的觀點也許是個起點。

一 自由多元論的觀點

中國當代前仆後繼的民主運動，從1919年的「五四」到1989年的「六四」，

* 本文承黃煜博士及趙月枝博士過目，並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沒有一次不以自由民主為訴求，沒有一次不高舉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旗幟。儘管(也正因)官方把自由多元主義看成洪水猛獸，我們更能夠從它理解後毛澤東時代的新聞特徵，我稱之為「非動員性的自由化」，與毛澤東時代的「動員性全權主義」迥異其趣。

自由多元主義肯定人民主權和個人自主性，長期與民主鬥爭互為表裏，聯合反抗各種封建的、專制的和獨裁勢力。它首先強調「消極自由」^②，即是不論個人和團體都有權免於國家權力的壓制，都有權自由表達各種不同的意見，而所有體制政策都是為了保護這種自由而設置的。傳媒是制約國家權力的重要機制之一，市場運作讓國家不得假借社會的名義吞食社會。伯格(Peter L. Berger)認為資本主義市場是民主的前提，因為它提供一個「與國家控制相對獨立的社會區域」^③。來舒邁雅(Dietrich Rueschmeyer)等人也說，資本主義的發展轉變了階級結構，所以和民主密切聯繫^④。伯格附加一個「但書」：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自由化只是民主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⑤。沒有自由化，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沒有民主；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雖然自由，政治卻不民主甚至反民主。准此而論，沒有市場經濟作後盾，中國的新聞自由不可能有實質的進展，但市場經濟卻不能保證中國會有新聞自由。

我所謂的「非動員性自由化」大致有三項主要特徵。首先，中國的傳媒體制當然是極不民主的，當局操縱傳媒搞派系爭鬥^⑥，壓制異見，又利用它粗暴地攻擊當局認定的各種真假敵人(包括異議人士、反抗的民眾、宗教組織和外國的領導人)。今天中國對傳媒控制之嚴厲，遠甚於開放時期的蘇

聯，與當年共產波蘭的差別更不可以道里計(波共傳媒必須與團結工會的反對派傳媒、教會的傳媒競爭)。話說回來，經過二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的「指令新聞」^⑦和「文化專制」^⑧畢竟多少被市場釋放的能量所銷蝕，弱化成為「權威型」體制，不再是至高無上的「極權型」體制了，兩種體制的差別絕非微不足道。市場遷就實用，與毛澤東的烏托邦格格不入。毛死後的領導人只要保得了權，不一定要侵犯社會與私人生活的「每個」領域，人民和傳媒因而獲得一些喘息空間；當局鎮壓異議人士和反對派，所憑藉的是國家機器，而不是發動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國家機器對傳媒的管理逐漸走向世俗化、正式化和規範化的道路^⑨。傳媒不再像過去塑造一個無所不包的、排他的、絕對的社會主義理想。在80年代的改革歲月中，新聞專業意識曾一度迅速抬頭^⑩，可惜到90年代反而被商業狂潮所淹沒。

第二個特徵，傳媒紛紛採取各種應變措施，以求在政經相對分離的局面下制勝^⑪。傳媒為了擴大市場，必須滿足更多的受眾，於是逐漸淡化國家意識形態。隨着中國整體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傳媒愈來愈不強調階級鬥爭，紛紛轉向實用目標，強調經濟現代化。經濟改革要求更多更好的信息服務，以改善管理、金融和技術的基礎設施，這些項目與抽象的階級鬥爭抵觸^⑫。在90年代，政府取消對傳媒業財政補貼，進一步衝擊傳媒的微觀經濟，迫它進入風雨多變的商海爭奪廣告。中央和地方黨的機關報式微，大塊地盤流向晚報、周末版以及沿海主要城市的小報。傳媒的運作環境、職業獎懲結構、機構內部的權力分配都跟着丕變^⑬。傳媒伺候黨和錢

「非動員性的自由化」有三項特徵：首先，經濟改革使傳媒不再像過去塑造一個無所不包的、排他的、絕對的社會主義理想；二，傳媒紛紛採取各種應變措施，以求在政經相對分離的局面下制勝；三，傳媒由黨喉舌的角色轉變為「黨的公關公司」，它們的任務是提昇黨的形象及合法性，而不是對民眾洗腦。

中國以往譴責西方財團壟斷傳媒，目前卻又在全國組建巨型的報業集團，其實是要以黨機關報為核心，吸納一些賠錢或出軌的報刊，以便管理控制，又可擺脫政府的財政負擔。坦白說，中國新聞界當前迫切需要的是免於國家干涉的「消極自由」，而不是讓國家機器滲入各社會部門的「積極自由」。

兩個老闆，充滿了衝突的張力。傳媒推出五花八門的編輯或市場策略，有的看似荒誕，說穿了，無非為了在官方的尺度內開拓商機^⑭。非政治化的娛樂日增，知識精英也許嫌它們庸俗無聊，但群眾寧可要這些東西也不要喧囂的說教。大致上，中國對報紙和電視的控制要比對雜誌、廣播和書籍嚴，而對電視新聞的控制又比電視娛樂更細。許多報紙的編輯坦承，他們的頭版講計劃經濟，中間的頁面講混合經濟，其餘的則倡導市場經濟。難怪何舟描述這種「分裂報格」是戴着社會主義的面具裝資本主義的身體^⑮。

第三個特徵，傳媒由黨喉舌的角色轉變為何舟所謂的「黨的公關公司」，它們的任務是提昇黨的形象及合法性，而不是對民眾洗腦^⑯。有人憂慮，市場不但沒有削弱黨的傳媒，反而讓官方意識形態重新包裝，既有利可圖，還可加強黨傳媒的威信^⑰。這種擔憂不是沒有道理，但其他論者以為目前黨國用經濟特權為餌換取傳媒的效忠，不管市場怎麼扭曲，只要有競爭，總會逐漸削弱頑固的黨國意識形態，並在非政治領域拓展一些空間^⑱。近年來有些內容創新(例如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北京青年報》或《南方周末》)的確令人鼓舞^⑲。

西方學者抨擊傳媒產權逐漸集中壟斷於少數財團之手，加劇傳媒資源分配的不均，甚至箝制言論自由的範圍^⑳。從英美的歷史來看，市場勃興，廣告取代發行為主要收入來源以後，激進言論和工人階級的報業因缺乏廣告支持而不斷萎縮^㉑。許多學者受到羅爾斯(John Rawls)㉒正義理論以及柏林(Isaiah Berlin)㉓「積極自由」的啟發，視國家為主要的社會中介力量，要國家出面促進「補償性正義」和社會

公平，保護社會弱勢團體的權益^㉔，甚至規劃傳媒領域以保障多元的聲音^㉕。左翼自由派傳媒法律學者費斯(Owen M. Fiss)認為國家只能糾正市場的偏差，抗衡市場對公共辯論的扭曲，不能取代市場或完善市場^㉖。自由民主的新聞企圖在自由與平等、個人與公共權利、國家與市場、尤其是在限制國家權力與利用國家確保公民權之間，達成某種溫和的平衡。

自由與平等乃一馬之兩轡，對民主的存在同樣不可或缺。如果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象徵極端平等，那也只能說是奴役式的平等。平等必須以自由為先決條件，不能反對自由。趙月枝感歎市場化驅使一些以農民、婦女、老年人及其他經濟弱勢群體為對象的出版物無法生存^㉗。這種憂慮出於高尚的情懷，但我們千萬不能因此美化那些「弱勢」媒介，須知它們根本沒有自主性，充其量只是黨國控制網絡延伸到各個細胞的一隻棋子。中國以往譴責西方財團壟斷傳媒，目前卻又在全國組建巨型的報業集團，其實就是要以黨機關報為核心，吸納一些賠錢或出軌的報刊，以便管理控制，又可擺脫政府的財政負擔^㉘。坦白說，中國新聞界當前迫切需要的是免於國家干涉的「消極自由」，而不是讓國家機器滲入各社會部門的「積極自由」。

總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就是「有權威主義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過程中，國家官僚機器不得不從一些非政治領域撤退，因而助長了新聞業的「消極自由」；雖然國家企圖操控傳媒，但也不得不與市場力量作有限度的妥協或合作。反過來，國家通過市場延續它與傳媒的「侍從關係」。必須指出，中國的新聞業絕不是

反體制的，傳媒更未在一些核心價值方面（例如個人權利、權力制衡、公共輿論的重要性）建立公民共識。目前這種缺乏整體構架的傳媒改革必然是短視的、脆弱的，只能揣摩變幻莫測的政治氣候，見風使舵。最可悲的則是政治濫權，市場規範殘缺，金錢的力量無遠弗屆，深刻而全面地腐蝕了中國的新聞界。

二 中國改革派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

1949年以降，中國共產黨一直敵視自由多元主義，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甚至禁絕「資產階級」的新聞教育。即使80年代的改革派學者和新聞工作者也未將自由主義當作抗爭權威主義的力量。他們在官方軌道裏靈活闡釋馬克思主義，減少教條的束縛，我統稱他們為「老左派」，以別於90年代的「新左派」。老左派多數領導過宣傳和意識形態陣地，在文革後慢慢偏離「正統」，但始終沒有發展出統一的立場，他們能夠運用的理論資源也比較龐雜而貧乏。

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囿於意識形態，或為了政治必要，他們總是選擇性地引用馬、恩（反普魯士新聞檢查）、列寧（反沙皇）和毛（反國民黨）的語錄，加以靈活解釋，作為立論的根基，庶幾肅清斯大林主義和晚期毛思想的流毒。可惜他們對外在世界的新聞實踐所知甚少，立論往往過於抽象和哲理化，提不出具體運作的方案。陳力丹的力作^②分疏馬克思傳播理論，雖然他沒有聯繫到中國的現況，但會心的讀者自然會下出自己的結論。有些改革派學者踏出官方劃定的界限，開始接受歐

洲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論點，這時黨內負責意識形態的官員就立刻出擊了。

第二，他們都表現着很強的國家主義傾向。文革劫後餘生，使他們寄望英明領袖鄧小平及其接班人胡耀邦、趙紫陽撥亂反正。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天經地義的，所以他們提倡體制內（黨內）變革，反對根本改變體制^③。他們脫離群眾運動，當魏京生等人抨擊共產黨和鄧小平的專制，他們是不以為然的^④。劉賓雁鼓吹「第二種忠誠」，從來無意推翻共產黨，而只希望用一支筆暴露官僚腐敗，以加強黨的合法性^⑤。想不到「反精神污染」運動（1983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87年）、六四天安門野蠻鎮壓（1989年），一波接一波，把這些意識形態禁忌的黨內知識精英刷出黨外。1989年之後一度加強思想控制，接着1992年以後中國經濟捲入全球化的過程，掀起眼花繚亂的消費文化浪潮，流亡海外的知識精英與國內情勢的變化更脫節。整體來說，老左派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本身並無重大建樹，但他們的勇氣卻發揮過若干解放的力量。

蘇紹智、阮銘、孫旭培等人回到毛澤東早年的著作，重溫他激憤地向國民黨爭取言論和公民自由的讜論^⑥。毛澤東認為中國唯有實行民主和言論自由，才能醫治歷史上的因循治亂。他援引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四大自由」來理解自由，還以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來解釋民主。這些文字早從欽定的《毛選》中失蹤了。退一步說，在官本《毛選》裏面，毛也提出「新民主主義」，設想革命後中國應該先有幾十年的過渡（其理念有相當的自由色彩），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以後才邁進社會主義。他拒斥

80年代的改革派學者和新聞工作者在文革後慢慢偏離「正統」，但始終沒有發展出統一的立場，他們能夠運用的理論資源也比較龐雜而貧乏。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囿於意識形態，或為了政治必要，他們總是選擇性地引用馬、恩、列寧和毛的語錄，作為立論的根基；第二，他們都表現着很強的國家主義傾向。

毛論往往為策略的需要立場不一，改革派理論家們不得不挖掘他的自由面，來對應共產黨的蠻橫專斷，以毛之矛，攻毛之盾。他們對毛思想提出「另類」（如果不是相反）的解讀，縱然不敢保證不出事，卻大致符合80年代體制內改革的精神。

了民粹思想，認為不應該跳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由封建主義進入社會主義。諷刺的是掌權後毛澤東所做的，正恰恰和奪權時毛澤東所說的相反。因此蘇紹智提倡恢復「新民主主義」思想^⑭。毛論往往為策略的需要立場不一，改革派理論家們不得不挖掘他的自由面，來對應共產黨的蠻橫專斷，以毛之矛，攻毛之盾。孫旭培重複毛的話說，共產黨的傳媒應該像和風細雨，通過溫和的思想教育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要動不動像狂風暴雨，搞激烈的階級鬥爭，事事無限上綱為「敵我矛盾」^⑮。對毛思想提出「另類」（如果不是相反）的解讀，縱然不敢保證不出事，卻大致符合80年代體制內改革的精神。

新聞媒介除了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也是傳達信息的工具。連這麼簡單的命題，都得喋喋不休，引起激烈的鬥爭，在外人看來簡直匪夷所思。官方教條說傳媒的「黨性」就是「人民性」，兩者同義。胡績偉卻說人民性高於黨性^⑯。胡績偉是《人民日報》的老社長。他指出歷史上黨的路線走錯，報紙也跟着錯到底，還會受到表揚。但在70年代末，黨被「極左派」控制，《人民日報》沒有跟風，堅定支持鄧小平復出。他說，正因為報紙站在了人民的一邊，才沒有重蹈黨的覆轍。他從實踐的經驗中體會到，新聞界應該置人民利益於首位，而不應盲目執行黨的指令。主管意識形態的沙皇胡喬木隨着攻擊他，胡績偉於是補充說，人民性高於黨性，但來自黨性，保守派仍不滿意。此外，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王若水^⑰，負責《人民日報》理論部，80年代初期從法蘭克福學派中發現「青年馬克思」的思想。他引用「異化」的概念，批評斯大林主義和毛冒

進主義在中國產生的極左遺毒，以致人民公僕搖身變為人民的壓迫者。馬克思歸咎巴黎公社的失敗於缺乏直接選舉和出版自由，所以王若水呼籲把激進的人道主義思想注入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胡喬木的打擊如影隨形，聲稱馬克思的異化只能發生在資本主義，譴責王若水醜化黨和社會主義。王若水和胡績偉終於在1983年去職。

政治經濟學家蘇紹智吸收蘇聯和東歐某些異議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是斷裂的，而有歷史的承傳^⑱。他主張「具有人性面目的社會主義」，不止脫胎於資本主義，更應當繼承超越資本主義。他說，法國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和博愛等口號，這是工人階級和新興的資產階級聯合的光輝勝利；時至今日，社會主義國家應該發揚這些價值，以支持世界工人群眾繼續向資產階級抗爭。他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實行普選、議會制度，監督權力，保障新聞自由；此外，由於社會主義化生產工具（包括傳媒）為公有，故優於資本主義^⑲。蘇紹智的觀點沒有具體展開，但對黨國的教條已具有潛在的顛覆性。

沿着這條理論線索，孫旭培提出相當可敬的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理論。他先承認資產階級出版自由體現了「普遍形式」，民辦傳媒有權自由報導和批評政府事務，但由於資本的壟斷，這種形式自由對工人群眾空洞無意義。他繼而抨擊蘇聯模式的異化，原先列寧只壓反蘇維埃和反革命的出版物，斯大林卻把所有的言論渠道國有化，成為黨的宣傳工具，以致剝奪了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他引證恩格斯的話說，黨報是黨的「旗艦」，而不是「喉舌」。最後，他提出了一樁看似完美的

婚姻，也就是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對經濟基礎的控制，一方面結合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形式，兩者綜合為一^④。在這個新的模式下，新聞記者代表人民(可惜他未為「人民」下定義)，在共產黨的權力界限內自由報導、表達觀點和進行批評。他還擬出一個宏大的傳媒結構^⑤，允許各種社會、政治和職業團體出版非黨報刊。他說，黨報必須對憲法和黨負責，而非黨報刊只須服從憲法。

改革派的論點有點像空中樓閣。列寧主義政黨果真那麼仁慈，願意接受憲政的制衡，願意面對正當的挑戰，豈非天下太平？論者總是先讚頌體制一番，才含蓄地批評黨的僵化。有人甚至以為西方民主就是開明專制。至於黨與人民的矛盾無法解決怎麼辦，他們從無答案。他們最後不徹底拒絕黨，又曖昧支持黨。他們的藍圖很模糊，只有孫旭培提供一個比較具體的範例^⑥，但他所推崇的鐵托(南斯拉夫)傳媒模式是否那麼理想，自又另當別論。論者在讚頌馬、恩、列寧和毛澤東反對新聞檢查制度時，難道不知道自由民主國家早已在制度和法律上落實這些保障了？他們的「拿來主義」，無視於資本主義和現行社會主義兩種傳媒體制水火不容，卻從中篩選一些要素，然後放在一個更高的理論抽象層次上揉合。如何在這兩種不同的體制中去蕪存菁，充滿了內在矛盾，殊非易事，勢必要進行複雜的辯證鬥爭，不是用超驗的形式可以輕易解決的。但無論如何，改革派的論述暗示了中國當局背叛「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確具顛覆意義。

相比之下，趙紫陽的幕僚認為民主不合中國落後的國情，只醉心於「新權威主義」。他們用可疑的東亞例證，

辯說政治控制可以促進經濟成長，中國必須集中政治權力，而分散經濟權力。其中陳一諮的自戀情結最露骨，他主張只有10%以下的人(最有知識、最有遠見、最有能力)才有資格獲得權力，由這10%的精英來教育和代表90%的民眾。另有一些人以為權威主義是民主的前奏，因而讚揚蔣經國利用他的獨裁權力引導台灣進入民主轉型^⑦。80年代中末期，趙紫陽的幕僚與改革報刊(如《世界經濟導報》)建立脆弱的聯盟，看來是戰術上的權宜之計。

改革派的衰落使馬克思主義的理想進一步邊緣化。90年代，消費文化甚囂塵上，金錢是唯一的新宗教。海外學界愈來愈關注中國新聞界在黨與錢之間掙扎，國內學界反而沒有甚麼聲音。如同共產黨解體以後的東歐，粗鄙的民族主義在中國復蘇，填補了官方馬克思主義所留下的意識形態真空，政府小心翼翼地利用這種情緒，又怕民眾不滿的方向失控。《中國可以說不》和《妖魔化中國的背後》都具體而微地反映並煽動狂熱的民族主義，張揚非民主和排外的危險情緒，根本談不上嚴謹的學術研究。一旦理論革新在極度商業化和粗鄙的民族主義浪潮中隱退，我們就進入了「新左派」的批評。

三 激進批判的觀點

在90年代中國出現一個新左派的小圈子，尖銳批判80年代的自由多元主義與老左派。國家支配的市場改革產生各種扭曲的後遺症，在90年代末開始畢露，自由多元主義和老左派都未曾觸及這些問題。先將新左派與老左派做一個簡要的比較：

改革派的論者總是先讚頌體制一番，才含蓄地批評黨的僵化。但無論如何，改革派的論述暗示了中國當局背叛「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確具顛覆意義。改革派的衰落使馬克思主義的理想進一步邊緣化。90年代，消費文化甚囂塵上，金錢是唯一的新宗教。海外學界愈來愈關注中國新聞界在黨與錢之間掙扎。

新左派認為中國新聞業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國家對民眾的壓迫，而是來自全球資本所支配的消費文化。他們批評市場拜物教為實踐草根新聞民主的大敵，是另一種形式的專制。他們追隨西方激進論述，常過度臆想和誇張中國的資本支配，造成「具體對象錯位的謬誤」，有時甚至與國家主義和粗鄙的民族主義合流。

(1) 他們是兩代人。許多老左派年輕時追隨共產黨革命，這些儒家化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涉足黨內改革，卻終被清洗出黨。新左派出生在1949年以後，有的在文革中當過紅衛兵。他們在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中接受大學教育，不像前輩遭受過國家恐怖的折磨，但也不覺得要以官方教條作為議論的出發點。他們接觸到自由多元主義，始則嚮往同情，後轉為刻薄批評。他們與西方激進批判的學術亦步亦趨，在不同程度上迷戀毛澤東式的烏托邦。

(2) 他們的社會立場不同。老左派與改革官僚結構結盟，共同分享經濟、社會與思想特權。為此，新左派攻擊他們帶有精英主義、貴族化和保守傾向，責備他們只提倡自由，沒有擔當民主^④。在中國，《讀書》月刊是新左派的重鎮。但許多成員受過西方教育，生活在海外，從屬於西方學術機關，他們的論述在左翼西方學界顯然比在中國國內更吃香。老左派由內向外看，新左派則由外向內看。

(3) 他們的中心論題、社會語境和理論資源互異。老左派摘取馬恩列毛的部分原典，來支撐政治與傳媒改革的論述。80年代還有許多毛派份子激烈反對市場的萌芽，老左派的論述定位於政治，除了附和鄧小平經濟改革的言辭之外，除了寄望市場經濟從根本沖淡政治權威主義，他們很少論及經濟動力。到了90年代，張旭東認為市場所創造的文化思想「比毛時代的中國更齊一、更同質」^⑤。老左派的政治論述在1989年天安門鎮壓後中斷，新左派的文化論述則在1992年後的中國發端，那時商品化已產生嚴重的異化現象。90年代，黨國只顧着掌權，人民只顧着致富，知識份子更加邊緣化，講甚麼都沒有人聽。新左派

從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等西方激進批判思想中尋找理論依據，批判全球化經濟中文化資本對中國黨國媒介商品化的影響。

新左派認為中國新聞業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國家對民眾的壓迫，而是來自全球資本所支配的消費文化。聽他們批評市場拜物教為實踐草根新聞民主的大敵，是另一種形式的專制，讓人不禁想起馬爾庫塞 (Herbert Marcuse) 批判發達資本主義為「單面」社會。他們追隨西方激進論述，常過度臆想和誇張中國的資本支配，造成「具體對象錯位的謬誤」^⑥，有時甚至與國家主義和粗鄙的民族主義合流。他們重拾迷惑西方激進學術界的毛主義語言，例如張旭東呼籲，社會主義是對全民的承諾，必須「創造一種超越資產階級模式的新民主、自由和平等」^⑦。他試圖從「餘存的社會主義構架內，重建烏托邦期望，以為發展政治參與和民主開拓新的可能」^⑧。總之，新左派想像的「社會主義民主」比「社會民主主義」更激進。新、老左派都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民主，但新左派比老左派更無情鞭打自由主義。

至今最重要的激進派傳媒著作出自趙月枝。她認為，中國新聞業不應只爭取「狹窄」的自由主義民主，並應進一步保存「社會主義革命的進步成果」。她追求的民主政體，既要監督政治權力，也要制衡市場力量所導致的結構性偏差^⑨。她對毛澤東思想的遺產既批評又同情，比自由多元主義者更激進，但比其他新左派(如張旭東、甘陽、崔之元、汪暉)溫和。

在此我們必須檢查激進批判派的三個前提。首先，在處理民主的內在緊張時，自由派傾向於自由高於平等，而激進派傾向於平等高於自由^⑩。

左翼自由主義者^⑥支持「負責的資本主義」，提倡以國家來「糾正」市場的偏差，但激進左派否定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有必然關係。趙月枝否認資本主義(市場力量、商品化)是言論自由和民主的前提條件^⑦；她承認市場有某些「進步因素」，卻筆鋒一轉，更贊成基恩(John Keane)視市場為一種宰制新聞的力量。她說目前中國的新聞業集黨國新聞和商業主義罪惡之大成^⑧。

第二，西方新左派抨擊資本積累與流通造成傳媒的不民主，他們站在民主國家的邊緣，向支配性的中心意識形態進攻，打游擊戰，鞭辟入裏。只是這些浪漫的想像可以整個硬搬硬套到中國嗎？趙月枝響應西方批評家，宣稱市場機制導致「民主的衰落」，造成公共領域的危機^⑨。中國本來就沒有民主，怎麼「衰落」？中國本來就沒有公共領域，何來「危機」之有？中國的公共領域與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說的不同，不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介」，而是「社會滲透到國家的特定領域」的結果^⑩。趙月枝借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概念，質疑自由派的論述，否認中國傳媒的意識形態已經淡化^⑪。她強調霸權無所不在，有意識和無意識、或明或隱，而傳媒是活躍的鬥爭現場，人們透過它在日常生活中反對意識霸權。使用廣義的霸權概念當然無可厚非，但這種全稱命題切莫混淆了自由主義、權威主義與極權主義傳媒的界限^⑫。文革時期任何事物都無限上綱到政治問題，思之實在令人不寒而慄。何況中國官方的宣傳粗糙不堪，哪用得着細緻的「霸權」分析？

第三，斯帕克斯(Colin Sparks)^⑬以托派的情懷分析後共產主義的東歐傳媒。他主張研究焦點應該從國家與市場的關係移開，擺在如何實現群眾

民主的理想上。他說，除了政治精英或新資本家，傳媒專業人士和公眾對傳媒政策和操作都應該有發言權。趙月枝的看法與此接近，她承認新聞專業化儘管已開闢若干空間，更重要的是為公眾參與提供更多渠道^⑭。陳義甚佳，只是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進步成果」，彷彿毛澤東群眾路線的陰影不散。毛那矛盾重重的激進浪漫主義，在象徵意義上很迷人，但在實踐層次上卻令人幻滅。儘管一些激進知識份子仍迷戀它，中國人民卻早已徹底唾棄它了。老百姓經歷韋伯所說的「世界解魅」(disenchantment)的過程^⑮，終於揭開了毛主席魔力的面具。憑甚麼要在這個時候借屍還魂，以民主之名加諸人民的頭上？理論上說得天花亂墜是一回事，細節上怎麼實踐是另外一回事。激進思想長於「破」，短於「立」。

四 結 語

我所分析的社會理論都希望權威官僚的黨國體制能夠民主化，但它們對資本主義市場的評價不啻南轅北轍。東歐的開放並非拜賜於精英的善意，而是政經壓力產生精英階層內部分化所致^⑯。自由派特別強調「消極自由」^⑰，中國傳媒的「消極自由」很差，但比過去好得多。自由派相信，即便一個扭曲的市場也會創造某些空間，阻隔無所不在的國家權力。一些後現代主義者更天真地肯定消費市場已在中國開創民主文化。激進派指責國家資本主義加深傳媒反自由和反民主的傾向，又說消費文化與國家意識形態合成一體，傳媒鼓勵個人的消費欲望，置平等和公正的理想於不顧。馬傑偉說國家與傳媒「表面上衝突，但結構上是共存的混血兒」^⑱。

西方新左派抨擊資本積累與流通造成傳媒的不民主，他們站在民主國家的邊緣，向支配性的中心意識形態進攻，打游擊戰，鞭辟入裏。只是這些浪漫的想像可以整個硬搬硬套到中國嗎？

如果默默接受自由派的實用主義，危險可能是附和現狀，導致想像力枯竭；但空有理想，無法實現，充其量是一場筆墨的空頭戰，我稱之為「沒有政治的文化批判」。杜蘭指出，必須既保護又限制民族國家的權力，只有國家才能抗衡全球企業資本與信息掌握者，任何新的民主論述都必須以此為起點。

我認為，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是一種「經濟的政治經濟學」，拿來分析西方社會中的新聞異化，是一把利器^④。理由很簡單：西方傳媒相對自主，國家機器干預較少，激進學者盡可高高在上，站在各種人道主義的立場批評資本的種種扭曲。柯倫 (James Curran) 提出一幅深刻的「民主傳媒體制」藍圖，以公共服務的媒介為主體，兼容民間的、專業的、社會市場的和私人企業的多元聲音^⑤。這個構想極好，只是對飽受權威肆虐的傳媒來說未免奢侈。它們必須從下到上反抗赤裸裸的國家壓制。在此，自由派的「政治的政治經濟學」可以發揮積極的解放作用。市場自由化未必保證傳媒的民主化，但要是沒有強大市場的發展，民主化簡直不可想像。

我們要面對三個挑戰：其一，自由派強調自由，激進派重視平等。沒有自由的平等是權威主義的、壓制性的；但是沒有平等的自由是排他的，而最終是非民主的。為了兩者兼顧，華倫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把自由 (liberty) 和 平等 (equality) 合併成為「平等自由」(egaliberty) 一個字^⑥。其二，如何兼顧理想和實踐？如果默默接受自由派的實用主義，危險可能是附和現狀，導致想像力枯竭；但空有理想，無法實現，充其量是一場筆墨的空頭戰，我稱之為「沒有政治的文化批判」。其三，世界中心發展出來的論述，如何配合區域的、民族的和地方的論述？有哪些西方論述可以借鏡 (不是照搬) 來中國分析一層層的具體問題？

冷戰終結，全球化的進程加劇。歐洲共產主義崩潰導致傳媒的自由化，讓不同精英派系可以公開辯論，然而民主的「市民社會」尚待形成，舊的政治精英已經和新資本家 (本國的和

國際的) 勾搭，傳媒漸有被他們操縱之虞^⑦。同樣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加速權威主義國家與世界經濟動力的尖銳衝突。中國已同意讓西方跨國公司投資電訊和互聯網市場，各種信息會不會通過新舊科技滲入中國？會不會擴大國內年齡、社經地位和城鄉之間的信息差距？會不會衝擊黨國對傳媒的控制？

最後，地方性、民族性和全球性的關懷逐漸相互滲透，中國傳媒如何平衡普世原則 (人權，言論自由) 與民族論述 (主權)？毛澤東是一個激烈反帝而極端封建的君主，但他曾提倡反帝和反封建同時並進。我們應該排斥義和團式的民族主義囈語，或一些新左派只反帝不反封建的論述。杜蘭 (Alain Touraine) 指出，我們必須既保護又限制民族國家的權力，因為只有國家才能抗衡操縱資本與信息的全球跨國企業。任何新的民主論述都必須以此為起點^⑧。中國傳媒必須掙脫國家控制與全球資本的束縛，這對塑造新的、民主的國際傳媒文化都有深意。

劉擎 譯

註釋

① Xudong Zhang,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Social Text* 16, no. 2 (1998): 1.

②③④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⑤⑥ Peter L. Berger, *The Capitalist Development: Fifty Propositions about Prosperity, Equality, and Liberty* (New York: Basic, 1986), 79-81.

⑦ Dietrich Rueschemeyer, E. H. Stephens, and J.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⑥ Merle Goldman,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Post-Mao Political Struggles", in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ed. Chin-Chuan Le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 王若水 : 《胡耀邦下台的背景》(香港 : 明鏡出版社, 1997)。

⑦ Chin-Chuan Lee, "Mass Media: Of China, About China", in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ed. Chin-Chuan Lee (New York: Guilford, 1990).

⑧ Shaozhi Su,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and Media Control", in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⑨ Lowell Dittmer, "The Politics of Publicity in Reform China", in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Judy Polumbaum, "Striving for Predictability: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Media Management in China", in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⑩ Judy Polumbaum, "The Tribulations of China's Journalists after a Decade of Reform", in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⑪⑫ Zhongdang Pan, "Improvising Reform Activities: The Changing Reality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China", in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d. Chin-Chuan Lee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⑬ Carol Lee Hamrin, "China's Legitimacy Crisis: The Central Role of Information", in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⑭⑮ Huailin Chen and Chin-Chuan Lee, "Press Financ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in *China Review, 1997*, ed. Joseph Y. S. Che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⑯⑰ Zhou 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 of War: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Zone Daily", in *Money, Power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d. Chin-Chuan Lee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⑱ Xu Yu, "Professionalism without Guarantees: Changes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Post-1989 Years", *Gazette*, 53 (1994): 23-41; Yuezhi Zhao,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147.

⑲ 同註⑱ : Chin-Chuan Lee, "Servants of the Party or of the Market: Journalists and Media in China", in *Media Occupations and Professions*, ed. Jeremy Tunsta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an Zhongdang and Joseph Man Chan, "Encoding the Communist Ideological Domination: Changing Modes of Televis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hina", in *Television in Asia*, ed. Michael Richards (London: Sage, 2000).

⑳ Stanley Rosen, "Seeking Appropriate Behavior under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 同註⑲Zhao : 註⑲Pan and Chan。

㉑ John Keane, *Media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1991); Sue Curry Jansen, *Censorshi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Owen M. Fiss, *Liberalism Divid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6); John B. Thompson,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㉒ James Curran, "The Press as an Agency of Social Control: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Newspaper History*, ed. George Boyce, James Curran, and Pauline Wingate (London: Constable, 1978); Ben H. Bagdikian, *The Media Monopoly* (Boston: Beacon, 1992).

- ⑳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㉑㉒ Alain Touraine, *What Is Democracy*, trans. David Macey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7).
- ㉓ 同註㉑Thompson。
- ㉔ 同註㉑Fiss。
- ㉕ 同註㉑Zhao。
- ㉖ 陳力丹：《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北京：開明出版社，1993）。
- ㉗ Ming Ruan, "Press Freedom and Neauthoritarianism: A Reflection on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in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 ㉘ 蘇紹智：《十年風雨：文革後的大陸理論界》（台北：時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96），頁33。
- ㉙ 劉賓雁：《劉賓雁自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2）。
- ㉚ 蘇紹智：《馬克思主義新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2）；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2）；孫旭培：〈論社會主義新聞自由〉，《新聞自由論集》（上海：文匯出版社，1988），頁1-118。
- ㉛㉜ 同註㉚蘇紹智。
- ㉝㉞ 同註㉚孫旭培。
- ㉟ 胡績偉：《新聞工作論說集》（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 ㊱ 王若水：《為人道主義辯護》（香港：三聯書店，1986）；同註㉞。
- ㊲ 同註㉚蘇紹智，頁168。
- ㊳㊴ 同註㉚孫旭培，頁63；92。
- ㊵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0）。
- ㊶ Xudong Zhang, "Nationalism, Mass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Strategie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Social Text* 16, no. 2 (1998): 109-140; Yang Gan, "A Critique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in the 1990s", *Social Text* 16, no. 2 (1998): 45-66
- ㊷㊸㊹ 同上Zhang，頁111；135；130。
- ㊺ 任劍濤：〈解讀「新左派」〉，載李

世濤主編：《知識份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㊻㊼㊽ 同註㉑Zhao，頁191；10；152。

㊾㊿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87-103; 99.

㋀ 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London: Polity, 1998)；同註㉑Fiss.

㋁㋂㋃ 同註㉑Zhao。

㋄ Hui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and the Question of Modernity", *Social Text* 16, no. 2 (1998): 33.

㋅ 同註㉑；Hannah Arendt,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avanovich, 1968).

㋆㋇㋈ Colin Sparks, "Media Theory after the Fall of European Communism: Why Old Models from the East and West Won't Do Any More?" in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ed. James Curran and Myung-jin Park (London: Routledge, 2000).

㋉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s, 1958).

㋊ Eric Kit-wai Ma, "Rethinking Media Studies: The Case of China", in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 Chin-Chuan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26-36.

㋌ James Curran,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A Reappraisal",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London: Arnold, 1991).

李金銓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講座教授(1994-98)。